



裔然与宋初的 中日佛法交流

郝祥满 著



商务印书馆

裔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

郝祥满 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裔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郝祥满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

ISBN 978-7-100-08455-0

I. ① 裔… II. ① 郝… III. ① 中日关系—文化交流—
佛教史—宋代 IV. ① B949.2 ② B94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467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裔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

郝祥满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8455-0

2012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8

定价: 28.00 元

总序

在通常的学科分类目录中，“中日文化交流史”一般归入“专门史”门类，但其本质应当属于交叉学科，不仅其外延覆盖中国史和日本史，其内涵还涉及思想、宗教、法制、民俗乃至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

尽管作为一门学科地位尚不甚稳定，然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均有深厚的积淀。总体上说，日本起步较早，成果也颇丰硕；中国急起直追，点面均有突破。

日本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首推辻善之助的《增订海外交通史话》与木宫泰彦的《日华文化交流史》，虽都成书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但依然不失为经典，尤其木宫泰彦的著作经胡锡年汉译，成为众多中国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其次是森克己围绕“日宋贸易”的系列作品，即《日宋贸易之研究》、《续日宋贸易之研究》、《续续日宋贸易之研究》、《日宋文化交流之诸问题》，以网罗史料齐全见长；再则是田中健夫，成果集中于元明时代，如《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中世对外关系史》等，继承森克己学脉而多有创新。除此之外，实藤惠秀的中国留日学生、大庭修的中日书籍交流、池田温的中日法制交流、小曾户洋与真田柳的中日医学交流等研究，均有开拓之功。近十余年来，更呈群贤

辈出之势，如森公章、山内晋次、榎本涉、河野贵美子等，各有建树，令人刮目。

回观中国，在民国时期的抗战硝烟中，虽偶有吉光片羽的佳篇力作，如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等，但基调一直比较低迷；新中国成立后，硝烟已散，敌意未消，此门更趋凋零。迨及 20 世纪 70 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研究才渐成气候。

由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交叉学科特性，涉足该领域的学者也颇庞杂，除了日本学专家，专治国学各科专家也参与其中，依托各自学科领域的深厚功底，急起直追，以致短时间内后来居上，在局部点面屡出新意。

如在文学领域，严绍璦《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与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堪称珠联璧合，开创中日文学交流史新生面；在考古分野，王仲殊围绕“三角缘神兽镜”撰文著书，提出“东渡吴人制镜说”，震撼东瀛；于人物专题，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沈殿忠等《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拉近了与日本学界的距离；哲学思想方面，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日中儒学之比较》不拘旧说，创意间出；书籍交流方面，严绍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王勇等《中日“书籍之路”研究》等，文献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尤其架构“书籍之路”理论备受关注；古代史有汪向荣《古代的中国与日本》、王金林《奈良文化与唐文化》等，均有日文版问世；近代史有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等，颇得学界好评。此外，在港台地区，郑梁生的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高明士的隋唐东亚教育圈研究、谭汝谦的中日书籍互译研究等，均独树一帜，不可忽视。

如上所述，“中日文化交流史”涉及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日本虽然

起步较早，但论者多依据本国文献史料、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拘囿于传统史学观念，所以涉及日本大抵考证精当，事关中国或多语焉不详。中国的情况则稍有不同，主要有两点：涉足此门的学者基本上精通日语，又能读懂艰涩的日本古代汉文史料，语言优势为其一；在吸收日本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发掘中国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对传统的学说或观点加以佐证或修正，继而提出新见解，史料优势乃其二。

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学界虽起步较晚，但近数十年来进步神速，在某些点甚至面，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前述许多学者的著作在日本出版发行，以及王仲殊获“福冈亚洲文化赏”、严绍璦获“山片蟠桃赏”、王晓平获“奈良万叶世界赏”、严安生获“大佛次郎赏”等日本重要学术奖项，说明该领域的中日学者，已经进入平等切磋的新阶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周一良、严绍璦、王勇联袂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卷本问世，该丛书由中日双方各20余位知名学者执笔，同时在日本发行日文版，该丛书荣膺“亚太出版商联合会”学术类图书金奖，堪称中日学者联手营造这块学术园地的结晶。

本丛书聚焦于“中日文化交流史”，既顺应上述国内外学术界的大趋势，也反映出各位作者归属的学术团队的小背景，在这里有必要作个交代，以助读者了解每部作品的来龙去脉。

在日本研究渐趋兴盛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本人在杭州大学创建了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在“专门史”学科点招收“中日文化交流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98年该中心随“四校合并”而改称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遂在“中国古代史”学科点招收“中日文化交流史”方向博士生；2004年本人因故调离浙江大学，8名博士生最后挂靠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完成学业。

1989年创建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际，我把研究重点定位在“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并以开放模式运作科研项目，广邀国内外同道合作攻关。这些成果大多汇入《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奈良平安时期的日中交流——以书籍之路为视点》、《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诸书，先后在国内外出版。

我在浙江大学培养的8名中日博士生，虽然各自的专攻年代不同、侧重的领域相异，但一个共同特点是注重文献史料。回忆陈年往事，每周举办“读书会”的情景历历在目。桌子上堆满各类字典及参考文献，然后一字一句注释中日文献的相关史料，这些虽然看似枯燥乏味，但因此打下比较坚实的文献学基础。看到日后这批学生从“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当年的辛劳也不再觉得苦涩。

自从2000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算来时光已经流逝了10个春秋，现在他（她）们大多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在国内外高校独当一面。虽天各一方，但学脉相承，学术上的交流愈趋频繁，擘画这套丛书可谓水到渠成。然以“新视域”括之，我想大概以下几条可作依据。

首先，本丛书纵向由隋唐及宋元再至明清，每个朝代均有专著，上下衔接，自成体系；横向则涵盖历史、宗教、文化、教育、贸易诸分野，展现文化交流之丰富多姿。

其次，作者均精通日语，对日本学者的成果细心咀嚼，经过吸收与扬弃，依托国学底蕴、立足中国史观，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见识。因此，这些著作即使放到日本学界，相信也不会逊色。

再则，作者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文献学训练，对书中引用的大量中日古代汉文史料，不仅在断句、训字、释词诸方面用力颇勤，在文意的诠释、史料背景的推断上也有创见。

还有，整套丛书虽聚焦于“中日”，但作者视野多兼及东亚，在东亚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审视追踪中日文化交流的历程。从传统的文化双向交流研究，进化到区域文化环流研究，符合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

最后，各卷作者均有在日本长期留学或执教的经历，受到中日两国学术氛围的熏陶；而且，他们在攻读博士期间，辗转于“历史学”和“文献学”两个学科，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双重的学科背景来研究这个跨学科的主题，相信会有独到的发见。

本套丛书初拟八卷，即隋唐两卷、宋代一卷、元代一卷、明代一卷、清代两卷，虽然总体上由隋唐而明清，似乎串接成一部中日文化交流通史，然元明时代略显单薄；加之各卷的主题也未能一以贯之，如隋唐部分偏重于书籍与人物，宋元明部分围绕佛教，清代则以教育和贸易为主。我们这个团队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便是合作撰写断代的中日文化交流通史，届时或可弥补本丛书留下的缺憾。

这套丛书若能给读者传递“新视域”的些许愉悦，给“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吹入几丝新鲜气息，则所愿也。

王 勇

2010年11月30日

目录 Contents

绪论 裔然等来宋日僧的研究及其意义 1

第一章 裔然来宋求法的文化背景 28

第一节 宋朝的统一政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 28

第二节 日本平安时代流行的佛法 45

第三节 高调的平安语境对宋日佛法交流的影响 57

第二章 裔然在佛教东传史中的地位和影响 68

第一节 承先启后的裔然 68

第二节 裔然来宋求法及其周边关系 106

第三节 继往开来的裔然 136

第三章 来宋日僧“求法”与“巡礼”目的之辨 147

第一节 裔然来宋前后的话语分析 147

第二节 在中国现证体验与自日本往生净土 156

第三节 宋朝的高僧崇拜与裔然的寻根拜祖 164

第四节 “为是斗数”而入宋的裔然及所求佛法之宝 175

第五节 裔然建立日本大五台山清凉寺的努力 219

第六节 求法资历之辨与教派优劣之争 235

第七节 日本学者错误观点的思想根源 259

第四章 来宋日僧与宋日政治关系 265

第一节 宋朝与日本的文书往来 265

第二节 宋日两朝廷对来宋日僧的管理 278

第三节 佛寺在平安祭政体制中的地位 294

第四节 来宋日僧背后的平安贵族 300

第五节 宋初中日文化交流与情感交流 312

余论 宋日文化交流史的评价及研究态度 323

附录一 《裔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并瑞像造立记》 326

附录二 裔然年表 331

主要征引文献 336

主要参考文献 350

后记 354

补记 357

绪论

裔然等来宋日僧的研究及其意义

第一节 作为来宋日僧代表的裔然

一、以裔然为个案的研究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以佛法交流为中心的宋日文化交流史及其研究似乎显得相对沉寂。由于在宋代中日两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日本游离于中华帝国册封体制之外，中日两国文化、经济以及政治关系主要是通过由日本来宋的僧侣和由宋朝去日本的商贾来沟通的。它既不同于隋唐时期，也区别于元明时代，但它是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它的研究应该同样重视。

本书首先要确定的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于宋日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可以从去日本的宋朝商人或来宋朝的日本僧人两个方面来考察。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本书主要从来宋日僧入手，介绍以佛教为中心的宋日文化交流的历史面貌，探讨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来宋朝的日本僧人，在日本学界被称为“入宋僧”，就是指日本来宋朝求法巡礼的僧人。本书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或者说从中国的角

度上来看，他们是由远方而来，故称之为“来宋日僧”，因为毕竟还存在“来宋印度僧”和“来宋朝鲜僧”等。日本学者用“入”是因为站在外人的角度而论宋朝的，作为中国人站在“内”的角度来看，自然应该称他们为“来”者了。因此，除了在后面相关引文中为尊重作者原文的需要之外，本书将打破常规，使用“来宋日僧”这一概念。而且在许多地方若跟着日本学者使用“入宋”、“入华”和“入中国”，没有“来宋”、“来华”和“来中国”读起来文从字顺；而“入宋”这一概念因此也就具有新的意义，即用于强调日本僧俗的意愿，突出行为的主体。

本书的研究对象锁定在宋初来宋朝巡访的几位日僧。日本自894年停止遣唐使以后，虽然政治上闭关自守，但在文化经济上却能网开一面，直到北宋年间，其国依然有僧人不断来宋朝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求法、巡礼，甚至有人借进贡之名义来中国，其中著名的有旡然、寂照、绍良、成寻、戒觉等人。若从这些人物中选择一个作为个案研究，则旡然（938—1016）的来宋最有特殊意义，是最合适不过的。本书将把视野从东亚历史空间收缩并聚焦到旡然这一个人物身上，再从旡然这一个案展开研究。虽然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界定在宋初，因为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以及判定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在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的需要，全书将涉及隋唐至南宋初期的有关历史和人物。

历史研究如果只有宏观的展望而缺乏微观的透视，或者只有解剖而无整合，只有史料罗列而无理论分析，那是不能真正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尤其做某个人物的专题研究更是如此。被作为个案来分析的旡然是一名曾经来宋朝的僧人，他的活动范围和涉及的人物与佛教

典籍、佛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中自然涉及佛学、宗教学理论的问题。本书立足于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从佛教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研究，力所能及地探讨一些理论问题。

二、关于裔然研究的史料整理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本书的研究从第一手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着手。裔然来宋朝求法的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保存下来的比较可观，包括愿文、日记、牒文、官符文件、酬答诗歌、佛像、图画等等。为了保证史料的完整性，一些文献资料将全文转载于正文或本书的附录中。

有关来宋日僧裔然历史资料的整理成果，首先要归功于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他编辑整理了《入唐诸家传考》等史料，其中《第六法济大师裔然考》等是本书的基本资料之一，以上收入《大日本佛教丛书》。

其次是桥本进吉、西冈虎之助等日本学者对裔然日记佚文的整理。除了这些文献资料外，还有部分历史记录和档案资料散见于日本《新订增补国史大系》、《大日本佛教全书》、《大正新修大藏经》有关篇章中。这些文献资料在日本学者后来的研究中得到整理。

有关裔然新史料的一次重大发现是在1953年，即日本昭和二十八年。7月29日，盛夏的骄阳照耀着日本京都西部爱宕山麓嵯峨野的五台山清凉寺，在当寺住持僧塚本善隆诵经之后，以桧本义春为长的数名法师谨慎地将平安时代（794—1192）后期的僧人裔然从宋朝携回日本的释迦牟尼栴檀瑞像从神坛上抬下，交给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的

丸尾彰三郎、京都府的赤松俊秀和中根金作，以及鹤饲光顺法师等进行清扫和调查，因为该雕像 1901 年就被明治政府指定为国宝。结果无意之中一枚宋朝铜钱的脱落使大家发现佛像胎内有大量纳入品，而且还有不少文字资料、图像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史料有：

（一）972 年裔然亲笔撰写的《敬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梵释诸天神地祇现当二世结缘状》，日本学者通称之为《现当二世结缘状》或《义藏裔然结缘手印状》。

（二）985 年裔然请宋朝僧人端鉴代笔的《裔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并瑞像造立记》，本书简称《瑞像造立记》等。

翌年，即 1954 年 2 月 4 日，日本政府立即组织京都国立博物馆馆员、文化财专门委员、大学有关专家等十余人取出释迦牟尼栴檀瑞像内有关文物，进行综合调查研究。参与调查的毛利久于 1958 年 8 月在《佛教艺术》第 9 编第 35 号上发表了《清凉寺释迦像变迁考》一文，公布调查的结果（即日本所谓的“中间报告”）。其他参与者如塚本善隆等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就该佛像及胎内有关文书的内容发表了有关文章，掀起了对裔然和其他来宋日僧研究的新高潮。以这些文物的发现为标志，可以将日本的裔然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一时期的研究因新史料的获得得以对前期的有关研究加以修正，兹摘要列举如下：

（一）裔然的出身及出生日期被订正；（二）确认了释迦牟尼佛像的三传性质，在此之前传言它是一传或二传，在开封被调包；（三）造像博士确认为张延皎、张延袭兄弟，推翻了此前日本学者“雕佛博士张荣”的定论等。

国内对于裔然等来宋日僧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很不够，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有关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多散见于《宋史·日本传》、《佛祖统纪》、《玉海》、《元史》、《杨文公谈苑》等书中。对相关零散史料的收集、系统整理和研究,近十年来以浙江工商大学王勇教授为代表的不少学者正在进行,成果也在陆续发表,本书可归于其中。

第二节 日本学者对宋日佛法交流的研究及结论

一、日本学者前期研究的三大结论

日本学者对裔然等来宋日僧的相关研究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即在“大亚细亚主义”论高涨之时,为配合日本“东洋思想”(后来演变为“大东亚共荣圈”论)的研究和宣传,在常盘大定、境野黄洋等掀起的日本调查和研究中国佛教历史和遗迹的大环境、大气候之下,一些日本学者利用日本侵略和占领中国之便,经过实地调查,就此课题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主要还是在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观点,我们将它概括为三大结论:

日本学者前期研究的第一大结论是,裔然等日僧来宋的目的是“巡礼”而非为“求法”。

日本学者西冈虎之助应该是最早研究裔然等来宋日僧的一人,他的《关于裔然的入宋》一文发表于大正十四年(1925)《历史地理》杂志四十五卷第二号上。在该文中他引用《裔然为母修善愿文》所载文字:“我是日本国无才无行一羊(半)僧也。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

也。”认为裔然来宋是“为修行而来，决非为求法”^[1]。他的观点为此后大多数日本学者所接受。

木宫泰彦可谓是研究中日交流史的泰斗，他的《日中文化交流史》^[2]一书至今在中日两国仍具有权威地位。该书初版（上下二册）于1926、1927年，在该书第三篇《五代·北宋篇》中他认为：

这个时代（五代、北宋）渡海的僧侣也很少，而且他们去中国的重要目的与其说是求法，不如说是继承前代之遗风巡礼天台山、五台山圣迹。^[3]

北宋时代入宋僧的主要目的，如前所述，是巡礼佛迹而非求法，因此，即使在他们留宋期间，特地拜访高僧，学习佛法之事几乎没有。像裔然的随从弟子成算那样，从印度烂陀寺三藏法天学习悉昙梵书，从梵学翻经三藏大德赐紫令遵阿闍梨稟受两界瑜伽大法及诸尊别法之事，毋宁说是弥足珍贵罕有的。^[4]

森克己是宋日关系史的专家，虽然以宋日经济关系的研究为主，但他关于宋日文化交流的一些观点也一直被奉为权威，与木宫泰彦略

[1] 〔日〕西冈虎之助：《裔然の入宋に就いて》，载日本《歴史地理》第四十五卷第二号，第53页。他的《关于入宋僧寂照的研究》（中文译名）载日本《史學雜誌》第34编第9、10号，《以源信为中心的宋日文化交流》（中文译名）载于《史學雜誌》第35编第12号、第36编第2号、第3号。

[2] 日文书名为《日華文化交流史》，国内有中译本书名为《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尽管该书为汉字书名，本书在正文中按照中国习惯重新翻译，引文则保持原貌。

[3] 〔日〕木宫泰彦：《日華文化交流史》，东京：富山房1987年版，第252页。

[4] 同上书，第288页。

有不同，他将宋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一分为二，即：

日宋交通时代在宗教方面与大陆的联系，主要在人员往来，继入唐僧之后不断渡海的所谓入宋僧侣群。但是虽说是僧侣群，在此明显存在两大类型，即必须区分为前期入宋的巡礼沙门与后期入宋的求法沙门两类别。^[1]

日本学者前期研究的第二大结论是关于裔然等日僧来宋与国家文化政策、政治外交之间关系的。这与日僧是为“求法”还是为“巡礼”而来宋朝这一讨论密切关联，核心问题是裔然等日僧来宋朝是代表日本朝廷的行为还是纯粹的私人行为？他们是为国家求佛法还是为个人修行？此问题再进一步引申就是，来宋日僧的行为倘若是代表日本政府与宋朝交往，裔然等的来宋是否反映出宋日之间存在着朝贡关系？是否有国书往来？这关系着宋朝是否册封过日本的问题，关系着日本民族自尊的问题，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很激烈。

日本学者森克己作为宋日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关于北宋初期来宋日僧的身份，以及日本朝廷批准派遣僧人来宋的目的提出如下主张：

在宋日交通初期入宋僧的目的不包含任何政治的、物质的性质，仅仅为从末法思想出发巡礼大陆五台山、天台山等圣地。而且他们所向往的大陆圣地巡礼也是当时贵族阶级的憧憬，因此得到来自一般贵族的支持……就是说，入宋僧们是作为贵族社会宗

[1]〔日〕森克己：《日宋文化交流の諸問題》，东京：刀江书院昭和二十五年（1950）版，第101页。